

# 论“汉老子”

熊铁基 刘玲娣

《老子》这部道家经典，自其诞生以来，就受到历代各个阶层的广泛关注，至今仍传衍不息，对《老子》的解释也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正如宋人杜道坚《玄经原旨发挥》所言：“道与世降，时有不同，注者多随时代所尚，各自成心而师之。故汉人注者为‘汉老子’，晋人注者为‘晋老子’，唐人、宋人注者为‘唐老子’、‘宋老子’。”人们对《老子》进行研究，虽然从战国时期就已开始，但是《老子》真正焕发新意却是在汉代。从汉初开始，人们重视《老子》，读《老子》，注《老子》，好《老子》之术，在包括政治、学术、养生和宗教等诸多领域发挥和利用《老子》，老学真正气象更新。如果把“汉老子”放在整个老学的学术演变历程中来看，“汉老子”是最具变化和灵活性的一个阶段。本文拟就汉代老学学理的演进和《老子》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实际运用作一概述，力图揭示“汉老子”的基本特征。

## 一、《老子》在汉代的流传

先秦典籍，大多经过口耳相传辗转传抄而流传下来，门人后学在传写的过程中，少不了有所增削。《老子》的流传，主要是依靠历代《老子》注本。《汉书·艺文志》著录了四种《老子》注本——《老子邻氏经传》四篇、《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刘向《说老子》四篇。由于这些注本皆已亡佚，我们对邻氏、傅氏、徐氏等人及其所据《老子》祖本无从知晓。不过由此可以看出，一是《老子》在当时是作为“经”被研习的，二是汉代已经出现不少《老子》传注，三是这些《老子》“经”、“传”的祖本可能不是完全相同的。

简帛《老子》的出土，使我们得以进一步思考《老子》的版本问题。帛书《老子》大约抄写在汉初，而成书于汉武帝时期的《淮南子》所引《老子》原文既与帛书《老子》有很多不同，又与晋代王弼《老子注》有很多不同。可以推测，《淮南子》引用的很可能是与王弼祖本不同的汉初的另一种《老子》传本。

学术界对帛书《老子》的成书时代看法比较一致：甲本大约抄写在秦汉之际(汉高祖之前)，乙本抄写在汉文帝时期。但是关于简本的抄写时代和流传版本，一直众说纷纭。各种观点的主要分歧在于：简本到底是单独发展的另一种《老子》版本还是今本《老子》的前身？我们认为，尽管简本300余句中有60余处异于帛书本和今本，但二者内容上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并非两个完全单独发展的传本。如果简本是比帛书本更早的同一著作的传本，那么通过比较简本和帛书本与汉代传抄本之异同，可以看出《老子》在汉代发生了哪些变化，《老子》又是怎样被理解和运用的。

今本《老子》经文和简帛《老子》存在很多差异。如今本十九章，帛书甲乙本和河上公本、王弼本、傅弈本均作“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严遵本缺损对应的篇章)。《文子·道原》和《淮南子·道应训》引《老子》也云：“故老子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但是简本《老子》却作“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诈，民复孝慈”，并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之语。而且，简本无王弼本三十八章“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体，而乱之首也”等句，这段话经常被用来作为《老子》反对仁义的证明。《文子》和《淮南子》引用的《老子》祖本，应该是汉代较为流行的版本。这种摒弃仁义的绝对化观念很可能是继承战国时期的思想而来，并非《老子》原意。如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庄子·在宥》中已有：“故曰：‘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庄子·胠篋》亦云：“故曰：‘绝圣去知，大盗乃止。’”《庄子》行文凡引《老子》之语多以“故曰”开头，所以上述引文应该直接来自《老子》。或许庄子在引用时有意改变了《老子》经文，使《老子》更具反人文性；或许在《庄子》之前，已经形成“绝仁弃义”的《老子》，帛书《老子》是继承战国传本而来，并非当时抄手有意而为之。

又如，凡今本所见“无为而无不为”者，在帛书中均无踪迹。据高明先生统计，帛书有11处讲“无为”，但无一处讲“无为而无不为”。他据此推论，“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不出于《老子》，它是战国末年出现的一种新概念，可以说是对《老子》无为思想的改造”。(高明，第425页)但是简甲本既有“道恒亡为也”也有“亡为而亡不为”之语，足证在战国末期之前就已产生“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丁原植，第83页)《庄子·则阳》中也说：“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庄子·知北游》：“故曰：‘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从时间上看，《庄子》书离简本老子较近，继承了简本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可是稍后的帛书老子为何不见半点踪迹？所以，从战国开始，《老子》抄本就很多，互相之间存在一些大大小小的差异。汉代的抄本既有讲“无为而无不为”的《老子》，如严遵本、河上公本、想尔本以及后来的王弼本，也有只讲“无为”的，如帛书《老子》。汉代以后的注老作品甚多，帛书老子中的“无为”思想有多处被改动，各注本改动次数不一，但基本都因循着“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致使这一思想成为《老子》一书的主要特征之一。

另外，关于《老子》的编次问题，历来也颇多争议，这一问题也涉及到汉代《老子》是如何流传的。河上公本、王弼本以降，都分《老子》为道经和德经，按照道上德下的顺序编排。但帛书甲乙本无任何篇名，也没有明显的分章，只是乙本篇末题有“德”和“道”的字样。从帛书甲乙本的文字排列顺序来看，显然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仔细对比一下，我们发现汉代和汉代以前的注老著作大多是德前道后，如韩非《解老》、《喻老》，帛书本、严遵本等，仅河上公本例外。《老子》后来演变为道上德下，应该

最早出于刘向编书之时。刘歆《七略》云，刘向定《老子》两篇八十一章，上经三十四章，下经四十七章。后来的河上公本分《老子》为上经三十七章，下经四十四章，与刘向编次略有不同，后世通行本多取河上公编次。所以，《老子》的基本编次是在汉代形成的。

总之，汉代《老子》流传很广，抄本也很多，影响很大，注老读老现象十分普遍。20世纪帛书《老子》和竹简《老子》的相继发现，说明《老子》在汉初以前已有不同传本。流传到汉代的《老子》版本，可能有很多种，汉人也可能对他们见到的《老子》进行了改造。这些不同的《老子》抄本，尽管内容大同小异，但都不离《老子》清静无为、抱朴守真的基本思想。

较之先秦时期老学的发展状况，汉人对《老子》的关注，是对《老子》的重新学习和发挥。汉代老学随着时代的演进呈现出多种变化，下面我们将具体说明汉代老子的变化发展，即从西汉初年治国为主到西汉中后期养生为重再到东汉末年的宗教化。

## 二、治国的老子

汉初统治阶级对老子的推崇和利用，重在继承和发挥《老子》一书中的政治意义，正如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述“道家”时所言：“道家者流……此人君南面之术也。”

这一时期大致从汉高祖建国持续到汉武帝时窦太后去世，学术界常用“黄老之治”予以概括。需要指出的是，汉初的黄老之学实际上就是融合了刑名法术乃至儒墨思想的老子之学。虽然有学者认为不能过高评价汉初的黄老之治，有的甚至认为黄老之学在汉初发挥的实际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汉初实行的确实是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的政策，并且实实在在受到了《老子》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先来看汉初君王对老子的应用。汉初君王好老子无为之术，史书明确记载的有惠帝、文帝、景帝和窦太后，以至于班固在《汉书·扬雄传》之赞语中言：“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者皆有是言。”

史书相关记载很多，如《风俗通·正失》言：“文帝本好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静无为”，又如《史记·礼书》记载“孝文好道家之学”，等等。窦太后是文帝皇后、景帝母亲，她的喜好直接影响到文景二帝的政治取向。窦太后在文景武时期是具有相当政治影响的人物：司马迁明确告诉我们，在窦太后的影响下，最高统治阶级不仅要读《老子》，还要尊崇老子之术。那么文帝和景帝是如何“尊其术”的呢？这涉及国家大政的很多具体措施。由于《老子》本身并没有为“无为”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这就为后人改造和发挥老子之“术”提供了宽广的余地。汉初大臣陆贾在这方面可谓奠基之臣。

汉廷初建，百废待兴，陆贾奉高祖之命作《新语》，其中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应用《老子》之术，为汉初治道提供了具体的指导原则。

在《新语·至德》中，陆贾为汉高祖描绘了一幅理想社会的图景：“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驿无夜行之吏，乡闾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乌不夜鸣。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然后贤离异议，廉鄙异科，长幼异节，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小大相怀，尊卑相承，雁行相随，不言而信，不怒而威。”

陆贾设计的这一蓝图，显然就是老子宣扬的以无为治国的小国寡民状态。在《新语·无为》中，陆贾强调“夫道莫大于无为”，也是直接来自《老子》。陆贾的主要贡献是在认同道家价值观的基础上，对无为之治进行具体的发挥和改造。众所周知，《老子》一书只笼统地提出了圣人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对于如何付诸实践，并没有给出详细回答。陆贾则从老子的“道”出发，继承并发扬了《庄子》提出的“内圣外王”的“道术”思维。在《新语·道基》中，陆贾说：“天生万物，地以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陆贾也和老子一样把道解释为超越感性认识的对象：“达幽洞冥，听之无声，视之无形”，但是从他“道术”的分析来看，道也是存在于具体事务之中的，是可以把握和认识的，他提出：“故设道者易见晓，所以通凡人之心，而达不能之行。道者，人之所行也。夫人道履之而行，则无不能，古谓之道。”（《新语·慎微》）将空洞的“道”解释为浅显易行之道，具体下移到人们的实际行动之中。具体的“道术”不仅包括天道，还包括王道、人道和治道，所谓“天道调四时，人道治五常”（《新语·术事》）。陆贾把论述对象重点放在具体的“人道”之上。与《老子》不同的是，陆贾认为“仁义”是人道的根本，这是以《老子》为本，对《老子》之“道”更进一步的发挥和改造。如“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仁者，道之纪”（《新语·道基》），等等，体现了汉初学术思想的整合潮流。在《术事》篇中，陆贾将“道”的实际运用进一步解释为“术”和“事”，认为“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至要而有成”。在其他篇章中，陆贾具体阐述了统治者如何实行“道术”的问题，如尚宽、慎刑、求贤等，大多是针对汉初的实际情况而言，因此每上一篇，皆能使刘邦及其左右“未尝不称善也”。

徐复观评价说，陆贾《新语》“其目的是在解决现实上的问题，所以它把儒家的仁义与道家的无为之教，结合在一起，开两汉儒道并行互用的学风”（徐复观，第141页）。钱福在《新语》序言中也说：“其书所论，且多崇俭尚静等语，似亦有启文景萧曹之治者。”可谓一语中的。

实际上，汉初在政坛上有一定影响的大臣多好《老子》，杨树达先生在《老子古义》一书中，据《史记》、《汉书》、《后汉书》、《汉纪》、《东观汉记》五书所载，得好老子者五十余人。（参见杨树达）仅《史》、《汉》两书中所见特别推崇黄老的人物就有陈平、曹参、窦太后、田叔、王生、邓章、汲黯等人。这些人物大多在汉初政坛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比如陈平和曹参位至宰相。以至于司马迁总结说，惠帝吕后时期“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政不出房门”（《史记·吕太后本纪》）。

除此之外，在汉初政坛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贾谊、董仲舒等人也深受黄老之学的影响。很多人虽然尊崇儒术，但论及大道，未有不取

老子之“无为”思想的。《老子》在汉初主要是作为治国之术被运用于实践之中的。

### 三、养生的老子

虽然汉初黄老之学主要是作为一种治术得到发展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汉初的“黄老之学”是纯粹的政治哲学。作为黄老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养生内容也是自始至终存在的，只是在汉初治术受到了特别的重视。《老子》中蕴涵的养生哲学，如“见素抱朴”、“知足”、“知止”、“少私寡欲”等等，在汉代成为黄老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武帝之后，《老子》从政治前台渐次退出，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一般民众，都将学习《老子》作为修身养性的重要内容，《老子》中的养生养性思想得以迅速发展。至两汉之际，黄老之学已蜕化为纯粹的养生之学，人们习黄帝和老子之书，目的都是为了修身养性，不再是为了治国理政。

这样的例子很多，如东汉初年思想家桓谭《新论·解蔽》说：“老子用恬淡养性，致寿数百岁”，对老子长寿表示赞赏。《后汉书》所载之任瑰、樊瑞等并好黄老言，清静少欲(《任光传》)；淳于恭善说《老子》，清静不慕虚名(《樊晔传》)；高恢少好《老子》，隐于华阴山中，终身不仕(《梁鸿传》)。他们清心寡欲，恬淡自守，或隐或藏，使黄老成为真正的养生之学。王充在《论衡》中也说：“以恬淡无欲，志不在于仕，苟欲全身养性为贤乎？是则老聃之徒也……不进与孔墨合务，而还与黄老同操，非贤也。”(《论衡·定贤》)同样也反映了这种趋势。

此外，现存的《老子河上公章句》，注重从养生的角度阐释《老子》，可以说是道家养生论的代表作之一。《河上公章句》注老不仅与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的很多思想相一致，而且保留了浓厚的汉代黄老思想的特色。其中对精气神的论述和元气生化说、天人相通说等，继承黄老学的基本观点，并构成了其治身理国思想的基础。在治身理国二者之间，河上公注笔墨之重点在治身，由治身而论及治国。在该书首章，作者就开宗明义地指出：“道可道，谓经术政教之道也。非常道，非自然长生之道也。常道当以无为、养神、无事、安民、含光、藏辉、灭迹、匿端，不可称道。”治国和养生相结合的政教之道自西汉以来就受到重视，而以养生为重的“常道”则是注者的理解。

然而，纵观河上公注，虽然处处标举养生，但全书未有任何神仙字眼，只不过它对长生久寿的追求，为后人附会神仙学说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它是将《老子》从汉代养生学说发展到神仙学说的一个转折点。

### 四、宗教的老子

汉代对《老子》的宗教化包括两个方面：对老子其人的宗教化和对《老子》其书的宗教化。

其一，对老子其人的宗教化。

老子成为道教的教祖，有一个从人到神的演化过程。早在道教创立之前，老子已经开始被神化了。五斗米道正是借用了老子已经被神化的历史事实，为自己确立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教主。至东汉后期，随着道教的产生，老子基本完成了其被神化的历程。这里我们简要清理一下老子在汉代的角色变化。

汉初，老子和黄帝常常相提并论，黄老之术作为安邦治国的方略之一，宏观上指导着王朝的政治实践，神化老子显然无此必要。汉武帝以后，儒学的官方化和神学化，以及作为一国之主的汉武帝对方术的沉溺和对神仙的信仰，构成老子在汉武帝以后逐渐被神化和宗教化的历史背景。

在道教创立之前的西汉中后期和东汉前中期，老子其人已经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叙述其生平事迹，语气多模棱两可，一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猜测的余地，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司马迁时代老子渐被神化的事实。如：“老子，隐君子也”；“莫知其所终”；“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等等。

老子被神化的历史中，秦汉神仙家功劳最著。刘向在《列仙传》中开始把老子列为群仙之一。生活在东汉初期的王充在《论衡·道虚》中说：“世或以老子之道，为可以度世，恬淡无欲，养精爱气……逾百度世，为真人矣。”可见当时世上已流行老子“逾百度世为真人”的说法了。同样生活在东汉初年的王阜，在《老子圣母碑》中说：“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老子俨然已是神仙的化身。

道教产生前后，人们编造了许多老子变化的故事，这些故事正如桓帝时边韶在《老子铭》中所说，多为“世之好道者，触类而长之”，如前面提到的《老子圣母碑》。《老子铭》进一步写道：“老子离合乎混沌之气，与三光为始终”，“道成身化，蝉蜕度世”。在《太平经》中，老子被称为“总领九重十叠”的“皇天上清金阙后圣九玄帝君”。《老子想尔注》则更云：“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饶宗颐，第12页)老子不仅是道的化身，而且成了道教尊神“太上老君”，俨然至高无上的教主。道教诞生后，更依托《老子》的内容，将其中的天道自然论和长生久视之道等进一步进行宗教发挥，建构起了自己的宗教神学体系。

以后的道教著作，基本不出此例。到东晋道教学者葛洪著《抱朴子》，则道家老子已经完全是神仙的代表，成为与儒家孔子“治世之圣”相对应的“得道之圣”。

其二，对《老子》其书的宗教化。

《老子》其书的宗教化，是伴随着东汉末年道教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现存东汉末年唯一的注老著作是天师道的经典《老子想尔注》残卷。它在神化老子和宗教化《老子》方面也起了重要的转折作用。

《想尔注》对《老子》的宗教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对老子之“道”的神学化。从宗教的观点来注释《老子》，首先就要神化老子的最高哲学范畴“道”。在《想尔注》中，“道”不仅是天地万物的本原，也是人格神的化身。

在《想尔注》中，“道”等同于具有神秘意义的“一”：“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同上)通

过神化“一”，神化了老子，也神化了“道”。“道”与“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道”一体，人神合一，成功地将“道”引向神秘的宗教领域。

《想尔注》还使“道”具有人格，具有人类的思想情感。“道”既是天地之本，万物之母，也是“吾”，是“我”：“吾，道也。帝先者，亦道也。”(同上，第7页)道又有人类的喜怒哀乐情感，如“挫其锐，解其忿”，其注云：“锐者，心方欲图恶；忿者，怒也，皆非道所喜”。(同上)由于“道”具有意识和情感，所以能对人类的行为产生相应反应，施以恩威奖惩。赏善惩恶成为“道”的最高意志之一：“道设生以赏善，设死以威恶。”也正是在此前提论证下，《想尔注》将《老子》的“道”与“诫”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早期道教道戒。这种宗教性的联系和发挥，可以说是道家思想向道教理论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其次，是将《老子》之道发挥为长生不死。道教追求的最高理想是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想尔注》在这方面对《老子》的宗教发挥大刀阔斧地进行。其典型例子就是将《老子》中的“王”字改为“生”字，如《老子》二十五章说：“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想尔注》将原文中的“王”字改为“生”，并作注曰：“生，道之别体也”(饶宗颐，第33页)，所谓“生”，就是长生不死。如在注解《老子》十六章的“公乃王，王乃大”之“王”时，也将“王”改为“生”，《老子》本文变成“公能生，生能天，天能道，道能人”，并注曰：“能行道公政，故常生也。能致长生，则副天也。天能久生，法道故也。人法道意，便能长久也。”(同上，第20页)

为了解决长生与死亡的矛盾，《想尔注》还改动了《老子》其他篇章的内容。如《老子》七章原文为：“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想尔注》将句中的两个“私”字均改为“尸”字，并注曰：“不知长生之道，身皆尸行耳，非道所行，悉尸行也。道人所以得仙寿者，不行尸行，与俗别异，故能成其尸，令为仙士也。”(同上，第10页)《想尔注》这种为我所用的方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固然造成了许多混乱和误解，然而作为一种宗教理论的建设手段，则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该书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完全用道教神学注解《老子》的著作，开了后世道教学者和信徒系统利用《老子》的先例，因此可以看作是道家老学向道教老学发展的转折点。

汉代《老子》除了治国、养生、宗教等主要发展方向外，还在道家自然哲学理论上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就是严遵的《道德指归论》(又名《老子指归》)。此书现缺后六卷，为现存《老子》最早注本。生活在西汉末年的严遵，“依老子、严周(庄周)之旨”，把老、庄二者结合起来，充分吸收利用庄子的思辨方式，解释和发挥《老子》的思想，对“道”、“有生于无”、“绝言”、“体玄”等问题，作了思辨性很强的论述。其以无为为本的本体论、由无生有的宇宙演化观等等，极大地推动了道家自然哲学理论的发展。

总而言之，汉代《老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无论是从实际的运用来看，还是从义理的演进来看，汉代《老子》的任何变化和发展都是时代的需要和反映。

## 参考文献

丁原植，1999年：《郭店竹简老子释析与研究》，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

高明，2002年：《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

古籍(部分)：《史记》，《汉书》，《后汉书》，《论衡》，《新论》，《新语》。

饶宗颐，1991年：《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

徐复观，2001年：《两汉思想史》第五卷《汉初的启蒙思想家陆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杨树达，《老子古义》之附录《汉代老学者考》，载严灵峰《无求备斋老子集成续编》。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冯国超(《哲学研究》2004年第4期)